放假了，这个老师去打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尹海月

四季轮转，胡永超的身份跟着转。

夏天到来，他是餐厅服务员、电话销售员、网约车司机……暑假结束，他变回胡老师。

在江西鄱阳县的一个村子，25岁的胡永超是一名乡村教师，教中小学生。每到暑假，他就去大城市打工。教师月收入2700多元，加上绩效奖金、补贴、住房公积金，年收入近6万元。

胡永超想赚更多钱，打了3年暑假工，挣到近2万元。他给母亲买了一部手机，送了姐姐两件新衣服，其余的钱存起来。后来，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小店，周末偶尔帮着照看。

有副业的教师并不罕见。在一些网络社交平台，有幼儿园教师介绍‘老师能做哪些副业’的经验，有高中教师分享业余时间写小说赚稿费的经历，还有的说，自己假期去烤肉店兼职8小时，一天能挣100元。

胡永超不认为教学之余打工有什么可羞耻的。“我上班兢兢业业，上课一丝不苟，对得起学生。”他在农村长大，学生大部分是留守的孩子，他希望他们好好读书，学会做人，长大能过想要的生活。他相信，“一个敬业的老师能塑造生命”。

学生给胡永超过生日

胡永超班级学生

“看到了吗？老师在我这里擦地板”

那是一个很难被忘记的时刻。胡永超蹲在地上，用抹布擦净餐厅走廊的地板。他注意到，不远处，老板对别人说：“看到了吗？老师在我这里擦地板。”

打工时，胡永超总要面对这样的态度。听说他是乡村教师，常有同事惊讶，还有人流露出不屑的神情，“意思是我们又穷又没前途”。

但胡永超喜欢这个职业。今年教师节，有学生送他一张画，画满红色桃心，写着：“我知道我们才相处几天，可是我知道你是一个好老师。”他教的四年级学生还曾自发凑钱，请家长去镇里买蛋糕，给他过生日。

有了这份价值感，对于轻视，胡永超不太在意。假期打工时，他不跟同事隐瞒教师的身份，也会告诉招聘者自己是教师，只能干两个月。

2016年暑假，胡永超在深圳推销净水器。同事叫他‘小胡老师’，有人看到生僻字，会问他怎么念，他也不认识，被大家调侃，不识字还教语文。

胡永超那年20岁，身边的同事大多比他还小。看到他们，‘小胡老师’会想起学生们。某个夜晚，他和同事一起站在街上，聊天、看星星。平时‘嘻嘻哈哈’的同事突然认真起来，说初中毕业后出来打拼，至今没有积蓄，厌倦漂泊，但回家挣不到钱。最终，这个年轻人流露出对胡永超的羡慕，“你至少还有选择”。

“小胡老师”马上想到了学生——有的也是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可能前途渺茫。暑假结束，胡永超把同事的故事带进了课堂，劝学生坚持读书。

打工的日子充满艰辛。2014年，胡永超实习结束，去杭州找暑假工，找了几天也没找到。朋友介绍他去西湖边一家餐厅做服务员，他和同事负责8张餐桌，点菜、传菜、倒茶、结账、处理顾客各式各样的临时需求，还要提防逃单，从上午10点干到晚上10点，每天都‘腰酸腿疼’。

胡永超还在厦门干过电话销售，每天工作10个小时，打300多个电话，3个月赚了8000多元。2017年暑假，他如约抵达上海一家健身房，被告知场地还得装修两个月。他离开上海，去景德镇开网约车，因为不熟悉路，总走错，他主动给顾客退绕路的钱。他算了算，发现几乎不赚钱，开了几天就回老家了。

在胡永超看来，没有轻松赚钱的兼职。刚当教师时，他尝试运营公众号，分享赚钱的方法、教书的趣事，每周更新，坚持一个月，只有300多人关注。

工作6年以来，作为教师的胡永超工资年收入增长近1万元，他说还是缺钱。实际上，他本人对物质要求不高，每天在学校吃、住，只在换季时买两套新衣服，但他想让父母生活得好一点。有了女朋友后，买房压力随之而来。3年前，他花费十几万元买了一辆轿车，积蓄花去大半。

打工时，大多数情况下没人关心他是谁，为什么来打工，所有人都为生计奔波。但胡永超打工不只为赚钱，他把自己想像成动漫电影《千与千寻》的主人公，每一次外出都是见识新的世界。之所以选择到厦门和深圳兼职，也是为了去看海。

在外面待久了，胡永超也会期待新学期的到来，再见熟悉的面孔。有同事知道他要返回校园，曾请他吃饭，为他饯行。

“他们急需看到更大的世界”

回学校，胡永超要坐高铁到鄱阳县，再坐一个半小时客车。高楼渐渐远去，柏油路变成水泥路，村子就到了。胡永超在一所九年制学校教书，三层教学楼外人影稀少，不时有鸡、鸭、鹅路过，校门口有几个小卖部，村民有时聚起来打牌，声音嘈杂。

这学期，班里有26名学生，超过半数是留守儿童。据《2019年上饶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作为江西省第一人口大县，2019年年末，常住人口134.75万人的鄱阳，约有26万人外出务工。2020年5月，隶属上饶的鄱阳县退出国家贫困县序列。

据胡永超介绍，在当地，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会将孩子送去县城读书，村里的学生越来越少。胡永超先后在3所学校任教，班里学生最多时不超过30人。2017年秋季学期，他被派到本乡镇的一个教学点任校长，学校共有十几名学生、3个年级、3位教师，其中两位即将退休。

3个年级涉及7门主课，一天最忙时胡永超要上7堂课，中午和傍晚还要辅导学生。此外，他还要做学校的卫生员和安全员。

初到学校，胡永超发现两层教学楼除一楼几间教室外，其余地方堆满垃圾，围墙断裂，教学楼的墙基被樟树根侵入。他每天利用课余时间打扫教室，申请资金整修校园，清理樟树。要将大树拔出来，房子得重建，最终只能砍去枝干，保留根部。

校园整洁了，学生却越来越少。胡永超到任的第三年，只剩三四名学生，教师也渐渐没了热情。

胡永超记得，教书第一年，他19岁，把自己当成学生的哥哥。学生没吃饭，他买面包。有人生病，他带去医院，“什么都想给他们照顾好”。

那些孩子有时让他想起童年时光。他上学时没有手机，同学们烫发、打架，无所事事。“如今的小孩接触更多信息，懂的比我们多，但也面临更多诱惑。”据胡永超观察，有些学生沉迷手机，家庭作业不能按时完成，回到学校无精打采。家长也很无奈——他们不在家，无论是完成功课还是日常生活，孩子都离不开手机。

胡永超觉得，比起城市里的孩子，农村孩子更害羞。在厦门，他看到同事的孩子、来旅游的孩子面对陌生人毫不胆怯，喜欢聊动漫、游戏等话题。他的学生则不擅长表露情感，表达对老师的认可时，会写进日记本或者小卡片里。

他认为这群孩子急需看到更大的世界。有一次，他在教学点给三年级学生讲课，提到‘我们是中国人，要热爱祖国’时，学生问他，中国是什么？他不由得有些惊讶，说中国是我们的国家。学生又问，国家是什么。胡永超又解释国家概念，打开地图，介绍人类历史、国家的划分。

“学校人少、交流少，他们回家后没人陪伴，能接收的课外知识太少了。”后来，胡永超上课时会向学生介绍一些常识，帮助他们多认识世界。有些孩子缺乏管教，养成了不良习惯，有人偷东西，祖父母不仅不劝阻，还引以为豪。有的不遵守校园秩序和课堂纪律，还欺负同学。

接触的学生越多，胡永超越意识到，问题学生背后都有问题家庭，“往往这些问题是教师无法解决的。”教师能做的，只是在他们成长的重要时刻，拉他们一把。

他班里一个男生，上三年级，上课不停地讲话、提问、干扰甚至动手打同学，批评几次也不管用。胡永超家访得知，男孩母亲改嫁，父亲外出务工，家中只有祖父母和一个弟弟。因为男孩爱惹事，常有村民找到家里来，奶奶就当面教训他。胡永超觉得，这孩子只是缺乏教导，就开始给他免费补习。

有一天，男孩的父亲回家了。胡永超没有留他补习，而是将他送到校门口。男孩高兴地跨上了父亲的摩托车，那位父亲转头对胡永超说，孩子不听话，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吧。“他还好，只是有些注意力不集中罢了。”胡永超说。

听见这话，男孩转过头，眼里闪着光，对胡永超挥手说再见。自那天起，胡永超发现，男孩开始接纳他，常围着他问东问西，打人的次数显著减少。

“站在他的角度，周围没有一个人喜欢他，可能我只是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但我给了他一个异于常人的评价，也给了他希望。他可能感觉到我是来帮助他的。”胡永超说，“等你有了一个被你从本质上改变的学生，你就会找到这份工作的意义”。

相比分数，胡永超更注重‘育人’。在深圳打工时，他在街头看到一位穿着精致的姑娘遛狗，并用纸将宠物的粪便捡起来，觉得姑娘‘很有素质’。后来，他常以这件事举例，鼓励学生做文明人：“以后你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时刻——不道德，不一定有人批评你，但内心坚守文明，往往会得到别人的尊重。”

“以劳动赚取收益，我不羞耻”

以前，胡永超也羡慕过身边的人。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初中毕业就开始创业，如今网店的生意很好，收入颇高。也有同学考研成功，毕业后找到年薪20多万元的工作，收入是他的4倍。

一位老教师跟胡永超谈心，说当年教师地位很高，不愁娶老婆，在学校吃肉都吃腻了。但看一眼现在的工资，吃顿肉还有些心疼。因为收入低，胡永超所在学校的男老师不到四分之一。他的朋友在另一所村小任校长，是全校唯一的男性工作人员，搬运书柜时，找不到人帮忙，叫胡永超去搭把手。

2020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四川通江一名中学教师利用放假时间兼职送外卖，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称，教师如果天天想着如何增加收入，会影响教学。还有人表示支持，认为教师利用休息时间兼职赚钱无可厚非。

据媒体报道，这位教师后来迫于舆论压力，辞掉了外卖工作。

在讨论这起事件的网站论坛中，胡永超发言称：“以劳动赚取收益，我不羞耻。”另一位自称是乡村教师的网友则写道：“如果教师工资足够高，谁愿意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送外卖呢？”

2015年6月，教育部印发《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违反规定的在职中小学教师，视情节轻重，分别给予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检查、通报批评直至相应的行政处分。

同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提出要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重点向村小和教学点倾斜、向条件艰苦地区倾斜，增强乡村教师职业荣誉感。

2019年年末，教育部出台政策，明确2020年要把‘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作为督导检查重点。2021年两会，全国政协委员、新余市副市长陈文华建议，这个拉平收入的目标‘应该固化并形成长效机制’。

除了提高收入，胡永超希望减少‘非教学’工作。基层教师不少身兼数职，有的当会计，有的当教导员，处理行政工作。刚工作那会，胡永超除了教学，还要负责每天给100多名学生发放面包、水果等‘营养午餐’，并进行信息登记。在教学点任校长时，他要处理学校各类表格、文件，负责本校信息系统的日常管理。

“一些工作非常烦琐，老师的工作重心无法集中在教学上。能够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上只管提升自己水平的老师，犹如一个可以自由追求梦想的富二代。”胡永超总结近几年的工作感受。

“教师的工作时间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占用教师工作时间的工作，并非全是教育教学工作。”2021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减少学校与教育无关的工作，大幅度削减部门摊派任务，减少非教育教学直接相关的任务，保障教师的发展时间和空间。

“你总是可以听到为教师减负的提议，但很遗憾还未完全落实。”胡永超感叹，“我自己穷我清楚，我是社会底层我也清楚，待在这里，要是没点信念，是不可能像我一样每天穷开心的。”

有时候，他感觉生活枯燥，会在夜晚开车去山路上兜风。他希望今年暑假，投资的店铺经营顺利，收入让他买得起房子。

胡永超看中的房子在景德镇，离他所在的村子半小时车程，商品房均价每平方米8000元-1万元。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教学点的孩子在教室学习

学生送给胡永超的教师节礼物

学生送给胡永超的教师节礼物

我看

投诉 消

□ 杨 杰

“我要投诉你”，这句话在互联网时代是不敢轻易说出口的。

“投诉”一词从消费者的傍身武器变成索命符咒，一旦说出投诉或是给出差评，你可能会收获如下套餐：夜间电话骚扰，电话被散布网上，逢年过节收到寿衣、冥币、粪便等晦气物品；甚至还有可能被人上门送惊喜。

就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的前一天，福州网约车司机撞死男乘客，双方因订单问题发生口角，男乘客下车后向车上扔了一个瓶子，据同行的死者女友所述，男乘客曾说要投诉司机。

最近，杭州一位女士称，三年前，她在某搬家平台遭到司机言语骚扰和威胁，她选择投诉，司机竟找到她家楼下，吓得她不敢回家。

网购时代，我们的家庭住址握在人家手里，敌暗我明，与其担惊受怕，不如改成好评，取消投诉，忍一忍保平安。

还有一种消灭投诉的方式是卖惨式软性胁迫。有一次，我在某电商平台上买了一款护肤品，收货后一打开，外壳粗糙到一眼就能看出是假货。我气鼓鼓地打了差评，没多久就收到某个归属地的电话。一个女孩带着哭腔诉苦，说打工如何不易，没过两分钟，另外一个归属地的电话打来，换了一个女孩，继续打悲情牌。想来这个工作比职业哭丧还不易，职业哭丧哭一会就完了，这个要马不停蹄地酝酿情绪。

前段时间有“快递员怕顾客投诉而下跪”的新闻，很多人一想，一个投诉，可能让外卖小哥被扣工资，一天白干；一个投诉，可能让餐厅掉出排行榜，曝光量大减；一个投诉，可能引来商家对你的“问候”、求情和威胁，消费者只能忍气吞声地给出好评。

这种趋势甚至发展成道德绑架，如果你投诉了一个外卖员或快递员，你就是不知民间疾苦，剥削劳动人民。

本来，线上的消费场景里，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比线下严重，因此引入评价机制，你可以真实地写下对店铺、司机、外卖员、快递员的评价，为后来者提供参考，也促进优胜劣汰，让行业发展更规范。评价机制让消费者有了更多话语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赋予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监督的权利。上海市消保委发布了2020年的投诉分析，涉及问题包括假冒品牌诈骗、低价体验套路、直播带货虚假宣传、快递末端投递服务不规范、酒店文娱票务预约难退款难、健身房诱导办卡“玩失踪”、长租公寓纠纷、网游充值退款难、商家“销售套路”、二手车平台解除抵押难等。问题实打实存在，如果评价的声音越来越小，甚至失了真，许多新兴行业只会越来越不规范。

投诉是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一种沟通渠道。现在，这个交流切换了频道，从消费者对话企业，变成消费者直面被投诉的外卖小哥和网约车司机。

在外卖行业，不管是平台配送算法出问题导致延时送达带来的差评，还是消费者不小心打了差评，外卖员都很难申诉成功。这导致骑手们对于差评充满负面情绪。

在某网约车平台，一有顾客投诉司机，客服惯常的做法是给出5元券、10元券补贴，这甚至让某些人动起歪脑筋，恶意差评司机，来获取平台优惠券，放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贩卖。

消费者评价的出发点应该是“善意的对话”，而不是“恶意的对垒”。

平台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只会招致怨气，看似抬高了消费者，其实只是将双方都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消费体验并未受到真正的重视。与其送券安抚消费者，不如花点功夫想想如何精细化管理投诉机制。

1956年，消费者投诉产品，可以专门办一场假冒伪劣展览会，那些漏水的锅碗瓢盆、炸裂的暖壶、掉色的花布、缩水的衣服、不出水的钢笔、擦不着的火柴摆在展台上，供人评头论足，品牌名称也不打码，指名道姓。当时的人们说，“广大消费者有权利要求工商部门尽快改进工作，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明需要。”

进入互联网时代，物质文明的程度大大提高，这样光明正大的投诉反倒越来越难了。无论什么时代，凡是消费者基于自身感受和体验所作出的真实评价，都应该得到尊重。

至于那些利用评价机制“勒索”商家的消费者，劝你也不要瞎折腾，大数据时代你在网上的每一步操作，都可能留下了“指纹”。

废弃的口罩去了哪里

实习生 邢逸帆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2020年，全球至少生产了1290亿个口罩。

这些使用完的口罩去了哪里？它们被人们随手丢弃在路边，被遗落在试衣间和餐厅里，被投入到生活垃圾中，甚至被冲进大海里。

2020年2月底，海洋学者加里·斯托克斯在香港索罟群岛进行例行海洋垃圾调查时，在仅100米长的海滩上就捡到了大约70个被冲刷上岸的口罩，此时距离民众开始大规模使用口罩只过去了6周。在海水的冲刷下，这些口罩的颜色开始发浑变暗。来不及考虑上面是不是还残存着尚未失活的病毒，斯托克斯把这些口罩串在长棍子上，很快就挂满了一根棍。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斯托克斯和他所带领的调查小组平均每周都能在海滩上收集到十几个“新鲜”口罩。

正常情况下，被冲上海滩的垃圾仅占海洋垃圾总量的15%，因此在这片小小的样本海滩周围，每周都大约有70个口罩如幽灵般漂入大海，然后不知所踪。

法国海洋保护组织“海洋清洁行动”也在法国东南部的蔚蓝海岸发现了口罩垃圾。蔚蓝海岸是法国东南部的著名度假胜地，海水四季清澈透明，像地中海的一条蓝缎带，电影名城戛纳、尼斯如明珠般点缀其上。然而2020年5月，“海洋清洁行动”在蔚蓝海岸海洋监测点也捞到了十几只口罩和橡胶手套，该组织成员乔弗里·佩尔蒂埃说，“考虑到法国刚刚订购了20亿只口罩，地中海里的口罩马上就要比水母还多了。”

在与法国一海之隔的英国，摄影师丹·吉安诺普洛斯在疫情封城期间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自己位于诺丁汉郊区的家里，几周过去，他终于打算到附近的街区散散步，透透气，顺便活动一下在角落积灰的那台照相机。但这次出门，他发现镜头里几乎没法避免“疫情垃圾”。口罩和橡胶手套总是突兀地出现在花坛里、散落在没系好的垃圾袋周围、卡在铁丝网和灌木丛里。他把这些口罩和手套一一拍照记录，在方圆不到一英里的街区里，他总共拍了300张照片。

在疫情期间，为了阻断病毒的传播，全球究竟有多少只口罩被匆忙生产出来已经难以计算。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3月1日至4月30日，中国验放出口的口罩就达到了278亿只。

一次性口罩的主要材料是熔喷布，和其他材料相比，构成熔喷布的聚丙烯纤维直径极细，只有1到5微米。这些聚丙烯纤维孔隙多、结构蓬松、吸附表面积大，可以很好地隔离杂质，过滤可能漂浮在空气中的病毒。聚丙烯还有一个更常用的名字：塑料。

聚丙烯会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老化、分解，变成越来越小的颗粒，直到变成直径很小的难以过滤分离的微塑料。这些被冲进大海的口罩分解出的微塑料将在未来300-400年间长期存在于海里，随着鱼类的摄食而进入食物链，随着水循环而进入土壤，最终进入我们的身体。更危险的是，口罩是直接由超细塑料纤维制成的，比起身边常见的塑料垃圾如塑料袋、外卖盒，口罩可能在粉碎过程中速度更快、更多地释放出微塑料。

对于野生动物而言，口罩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自2020年3月以来，英国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已经在英国沿海抢救了900多只被垃圾缠住的动物，其中大多数是被口罩耳绳缠住的海鸟。如果这些海鸟有幸在翅膀或双腿被困，活活饿死前被人类发现的话，它们的腿和关节也早已浮肿走形。

漂进海洋里的口罩还有另外一种化学层面的危险。口罩易于吸附杂质的特性对于人类而言是一种福音，但在海洋里，这种特性让口罩不断积累有毒物质。巴赫达尔大学的一项研究称，从市面上常见的熔喷布口罩里，不仅分离出了极细小的塑料微粒，还在渗滤液中检测到富集的铅、镉、锑、铜等重金属。斯托克斯解释道，“口罩在海洋里会不断吸收积累这些有毒物质，最终被海洋生物当作水母吃下去。”这些海洋生物可能会被口罩阻塞食道而饿死，也可能会缓慢中毒而死。唯有口罩，一旦被制造出来，就不会再消失。

面对突然增加的口罩，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做好准备。

在严格执行垃圾分类的德国，民用口罩被归类在“其他垃圾”，最终在垃圾处理厂被填埋或焚烧，并没有特别的处理措施。但整个2020年，德国政府都在呼吁市民使用可以清洗消毒的多层棉口罩，避免给垃圾处理系统带来太大压力。

在日本，医院和药局使用的口罩被归为医疗危废品，需要集中处置，而家用口罩被归为普通可燃垃圾类。为了减少街头的口罩垃圾，日本曾经把车站附近的垃圾桶都封了起来，但效果并不好，清理口罩的压力反而转移到了清洁工头上。2020年7月，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神奈川附近的清洁工每天能捡到15个漂到海岸上的口罩，处理口罩垃圾让清洁工感到压力巨大，不断担心自己可能已经暴露在病毒下。

“垃圾处理有三化原则，即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口罩‘垃圾’在这三个方面都很棘手。”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创始人刘永龙表示，“在疫情面前，人们对口罩的需求短期内不会减少，减量化很难做到。此外，口罩垃圾有卫生问题，很难回收利用。目前也没有可以分解口罩的无害化技术，只能集中填埋或焚烧，所以，应尽量避免口罩散失野外。”

口罩垃圾带来的困境还未完全显现，但也许是时候思考如何面对多出来的48万吨废弃口罩了。

参考资料：

巴赫达尔大学，《对一次性口罩中浸出微塑料及化学污染的调查》，2021年

联合国新闻，《一次性口罩与塑料污染》，2020年7月30日

日本广播协会（NHK），《新冠垃圾在海洋中日益增加》，2020年7月23日

英国广播公司（BBC），《新冠疫情：街头出现废弃手套口罩》，2020年4月8日

亚洲海洋组织（OCEANS ASIA），《海岸上的口罩：新冠疫情对海洋塑料污染的影响》，2020年12月